



西方经济思想史 18讲

张旭昆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旭昆 编

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经济思想史 18 讲/张旭昆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396-8

I. 西… II. 张… III. 经济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739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郑 嫵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西方经济思想史 18 讲

张旭昆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25

插 页 2

字 数 616,000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396-8/F · 1678

定 价 48.00 元

序言 简明通俗的思想史

张旭昆先生近日以我们共同编写的《经济思想通史》为蓝本，单独选择西方经济思想部分，编写了一本《西方经济思想史 18 讲》（以下简称 18 讲），其要旨是希望能够以简明通俗的方式，集中介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凯恩斯革命为止的发展历史。从内容上看，《18 讲》与《经济思想通史》相比较，在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部分，有较大的补充和改动，对于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思想，有一定的删减，如增加了对于格劳秀斯、达维南特、曼德维尔、杜能等人的经济思想的介绍；放弃了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介绍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学家、划分古典经济学和所谓的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做法；尽可能客观地按照各个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观点来介绍他们的思想。

以研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重点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政府制定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规制微观市场，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要深入了解今天的西方经济学，离不开对它历史的了解和掌握。同时，对于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经济思想史也往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就像凯恩斯当年面对主流经济学无法有效解释和克服大萧条的窘境，从马尔萨斯非主流的“有效需求不足”思想中得到启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一方面出现了转型经济所特有的问题，如产权的变更问题，另一方面又渐渐萌生出典型的市场经济共同所有的问题，如垄断问题，等等。当代经济学更擅长处理典型的市场经济共同所有的问题，对于转型经济特有的问题，往往没有成熟的答案。而经济思想史则有可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如 17 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关于公有产权的思想，就有可能启发我们深入考虑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合理有效的界定。

“温故而知新”，这一国学名言包含着深刻的道理，通过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相信人们将受到启发，有助于处理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蒋自强

2007 年 6 月 15 日于杭州大学教工宿舍

前 言

为何需要了解一门学科的历史？为何需要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

在许多本科专业，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门学科的理论，其逻辑体系越完善，对其学科发展历史的了解就显得越不必要，思想史的课程就越无地位。

当前许多学校的经济学专业已经不再把经济思想史作为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甚至选修课，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吗？

从单纯的学以致用目标出发，那些逻辑体系完善或者比较完善的学科，学生通过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就足以掌握其基本原理。只有那些逻辑体系欠完善的学科，似乎才有充分了解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观点的必要。

但是从发展一门学科的目标出发，即便是那些逻辑体系完善或者比较完善的学科，仅仅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也仍然是不够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的发展不会改变自然法则，而它的发展会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许多社会法则的变化，会导致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因此，根据已有社会现象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即便具有完善的逻辑体系，也往往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

经济学是一门会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学科，它与实际经济生活处于一种互动的正反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原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马歇尔的理论难堪，70 年代的滞胀让凯恩斯的理论蒙羞。因此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人们了解其历史，因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当时来看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但是对于解释以后出现的经济现象颇有启示作用的思想“基因”。整个经济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经济思想的“基因库”。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在 17 世纪的洛克和 19 世纪的马尔萨斯、萨伊那儿就已经萌生，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也早在 17 世纪的曼德维尔、19 世纪的马尔萨斯和 20 世纪初的桑巴特那儿草创。马歇尔和凯恩斯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实际上都是他们在熟谙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结果。

当主流经济学可以为当前的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为当前的经济政策提供有效论据时，了解经济思想史似乎没有多大必要。这往往是大多数时候的情况。然而一旦主流经济学不能胜任时，了解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性就会凸显出来。可惜这种时候不是常态。

但是居安需要思危。从长远来看，为了推进经济科学的发展，那些愿意献身于经济学的学子完全有必要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

二

《西方经济思想史 18 讲》主要介绍西方从其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为止，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潮，18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和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潮，边际革命以后一直到凯恩斯革命的经济思想。它涉及几乎所有具有重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等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研究市场经济为专长的西方经济学，对于一般国民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政府如何调控宏观经济、规制微观市场，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要深入了解今天的西方经济学，离不开对它历史的了解和掌握。

本书的特点：一是力求以原生态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二是尽可能以今天的眼光重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以往的类似书籍经常拘泥于某一专题来介绍其发展脉络，结果往往一叶障目，使读者不能了解那些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例如对于亚当·斯密的介绍往往侧重于其价值理论，而对于其主要的经济思想即关于如何发展经济的观点反而语焉不详。同时，由于受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评价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如对于萨伊的分配理论往往作负面评价，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何错之有。

本书写作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在介绍经济思想的同时，适当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本书可供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作教材使用，也可以供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作参考读物，还可以供学习、研究一般思想史的人员作为入门读物。

本书的不少内容，取材于蒋自强先生领衔主编的四卷本《经济思想通史》。蒋先生为本书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在此深表感激。书中所难免存在的一切不足，皆由本人负责。

张旭昆

2007 年 8 月 9 日于杭州嘉绿西苑

目 录

1	第一讲 经济思想的演化
18	第二讲 从古希腊思想家到中世纪经院学者
43	第三讲 重商主义时代的经济思想
97	第四讲 亚当·斯密：自由主义革命
145	第五讲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李嘉图、西尼尔
187	第六讲 19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西斯蒙第、古诺、巴斯夏
210	第七讲 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李斯特、戈森
231	第八讲 约·斯·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与终结
254	第九讲 边际革命中的英国经济学家
273	第十讲 边际革命中的奥地利学派
299	第十一讲 边际革命与洛桑学派：一般均衡的缔造者
322	第十二讲 马歇尔：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350	第十三讲 威克赛尔与瑞典学派
377	第十四讲 美国边际主义者——克拉克、费雪
396	第十五讲 马歇尔以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英美经济学的发展
425	第十六讲 威克赛尔以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奥地利学派的新发展
453	第十七讲 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制度学派
470	第十八讲 凯恩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504	参考文献

第一讲

经济思想的演化

经济思想史，顾名思义，就是介绍、研究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历史。为什么要了解、学习经济思想史？（1）经济思想的成果是一种思想产品，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有助于了解思想产品的生产规律，了解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特征，了解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地生产思想产品，了解政府的何种政策能够促进思想产品的生产。（2）以往的经济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有许多暂时不为当前的主流思想所接纳的理论观点。但是它们在社会面临新问题的时候，往往能够给人以启迪，帮助经济学家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例如，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从英国经济学的非主流传统中获益甚多，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对于《通论》的形成很有启示作用。面对人类社会不确定的未来，许多时候曾经非常有效的主流观点会由于新现象的出现而失去解释的能力，而以往被人们认作是无用的甚至错误的异端思想却反而会发挥效力。所以，了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哪些思想观念，对于经济学家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时发挥创造性，推出新的思想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经济思想演化的供求模式

经济思想如何发展演化，这既是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又是一个知识考古学问题。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可以借助供求模式来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思想市场上的需求包含两个方面：（1）需要解释哪些经济现象，需要解决哪些经济问题。（2）用哪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哪种政策来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思想市场上的需求指向，第二个方面可称之为需求落点。决定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因素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分析需求的决定因素时，必须区分需求指向的决定因素与需求落点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思想产品的供给所需的投入包括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和知识资本。

定义经济学家为愿意生产经济学思想产品的人。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经济学思想产品与生产其他学科思想产品的相对收益,以及从事科学活动与从事实际部门(政府、工商等)的活动的相对收益,是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事经济科学的相对难易程度。

广义的知识资本是以往所生产的各种经济学和非经济学的思想产品的总和。它并非全都参与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只有那些被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才参加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这部分知识资本可称做狭义知识资本。

经济学家的知识资本,从性质上讲,可以区分为两大部分:经济学知识和非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首先包括以往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说明,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以往分析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时所提出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分析方法。非经济学知识,包括经济学家的哲学观念,包括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包括各种基本能力,如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提出恰当假设的能力、发现重大问题的能力、为问题提供基本正确的答案或指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正确方向的洞察力,等等。

经济学家和知识资本决定了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它包括了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所可能生产的一切思想产品。它既表明一定的经济学家和知识资本的生产能力,也表明其局限。它表明一定的经济学家和知识资本能够解释哪些经济现象、解决哪些经济问题,无法解释哪些现象、解决哪些问题。

新思想产品总是出现在生产可能性集合与课题集合的交集之中。生产可能性集合表明,在资源和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下,哪些思想产品可以被生产出来。但这些思想产品中究竟有哪些将被实际生产出来,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们的选题行为。

经济思想自 16 世纪以来的发展,说明了供求模式在分析经济思想演化时的有效性。由于难以得到直接反映历史上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资料,只能从那些留传至今的经济学论著所解决的课题来间接推断当时当地公众和政府的需求。可以说,凡是适应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并成为需求落点的论著,往往受到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凡是没有迎合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论著,往往发表后不会被公众和政府所注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也不会引起专业学术团体的关注,也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一、富国裕民: 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经济学的主题

(一) 富国裕民的需求

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英、法两国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主要是如何富国裕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在理论上,他们要求说明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政策上,他们要求得到

能增加国民财富的对策。围绕着富国裕民这一主课题，形成了若干派生的子课题，如怎样增加王室和政府收入的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对外贸易问题等等。

公众和政府的这种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与那三个世纪中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密切关联。从经济上看，在那三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法两国都尚未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对于英国来说，起先是荷兰，后来是法国，一直是赶超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对于法国来讲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国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很容易（但远远不是肯定的）形成追求富国裕民的价值观念。从政治上看，英、法两国都已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状态，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追求国家的富强以及王室或政府财政收入的丰盛，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首选问题。

（二）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

与这一阶段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相适应，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包括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英国从配第到斯密的早期古典主义，法国从布阿吉贝尔到重农主义再到西斯蒙第（指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以前）、萨伊和巴斯夏，他们要解决的课题是一致的，即如何富国裕民，发展本国经济。区别在于对财富性质的不同看法上，在于对致富原因的不同看法上，在于如何致富的不同方法上。只有紧紧抓住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这一主线，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论著，才能把握这些论著的历史意义。

在这一阶段里，价值论、分配论并非经济学家们考虑的主要问题，不过是他们在考虑发展问题、富国裕民问题时的副产品。把价值论、分配论当做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尤其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论题，其实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理解和解释。而这种理解和解释受到19世纪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强烈影响。在这种需求指向的影响下，19世纪的经济学家更注重、更强调第一阶段的经济学论著中的价值论、分配论内容，以至于直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说史论著仍然是以价值论、分配论为主线来叙述从16世纪开始的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严重忽略了这些早期的经济思想中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这一主线。

如果要尽量避免对前人论著的主要内容的理解上的偏差，可以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前人论著的主要内容，即根据不同内容在论著中所占篇幅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对于书来说，可按页数计算）来确定一部论著的主要内容。该方法的假设前提是：作者总是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上花费最多的笔墨。当然这一前提未必完全无误，但在没有更好的定量方法来判定作品的主要内容之前，它显然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每位经济学家的论著都严格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法来判定其主要内容。但任何一位大体上浏览过英、法两国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的主要经济学论著的人，只要他不再过分偏重价值论、分配论，就总会发现发展论是这一阶段经济学的主题。

以威廉·配第为例，遍读他的五本主要经济学论著——《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货币略论》——就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税制、如何发展英国的经济、如何改变殖民地的落后面貌、如何正确看待货币。而价值论、分配论只是他考虑上述问题时的副产品。再比如说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算作价值论、分配论的内容比重很小，而可算作发展论的内容则触目皆是。只有杜尔哥，才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中，较多地谈到分配问题，但没有涉及价值论。

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其经济学论著的名称便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见，斯密所关心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关心构成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其经济自由主张的基础。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所关注的并非资源的最优化和静态配置，而是提出促进增长的条件。

《国富论》按中文版计算，上、下两册共 893 页。各部分内容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可列表如下：

表 1.1

内容主题	页 数	比 重 (%)	备 注
价值论、分配论	180	20	上册第 26—169 页，第 208—229 页，第 235—251 页。
经济发展理论	398	45	上册第 5—19 页，第 253—382 页，下册第 1—253 页。
财政理论	258	29	
其 他	57	6	

由此可见，发展论或富国裕民论在斯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价值论、分配论只占次要地位。价值论与整个《国富论》的规模与意义相比，似乎只是一个相当微小的分析点，一个局部难点。

从斯密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也可以看到斯密更重视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一般认为，《国富论》的前身是《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在《演讲》中，价值论、分配论都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这可以从价值论、分配论在《演讲》中的排序（第二篇第二部分第七节）及所占篇幅看出来。由《演讲》的内容来看，斯密的分配学说并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主要内容，尽管第一篇标题提到了分配问题。显然斯密未去法国以前，早已写好分工、货币、物价和各职业工资所以高低不同的原因这几部分，但分配计划还是个空白。后来，他从重农学派处得到了必须补充一个分配计划的意见，因此他把自己所想的计划附在已写好的物价学说之内。而且，斯密的价值理论完全是他的发展论或富国裕民论的附论，在《演讲》中，这一点特别明显，斯密认为使商品市场价格永远停留于自然价格之上，会减少国家的财富。使市场价格跌到自然价格之下的措施也有相同的影响。由此可知，斯密是把市价对自然价格的背离看做是减少国民财富的原因。因此，他就要探讨自然价格的决定因素和衡量尺度，以及市价对自然价格产生背离的

原因，这种探讨就构成了他的价值论。

对于斯密体系在欧洲大陆的最初传播者的萨伊，也可以用内容定量分析法分析其初版于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全书按中文版计算为534页。分析结果列表如下：

表 1.2

内容主题	页 数	比重 (%)	备 注
财富的生产	260	49	第一篇
财富的分配	118	22	第二篇
财富的消费	114	21	第三篇
其 他	42	8	绪 论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被后人概括为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理论，在萨伊这本书中所占据的地位。应该说，萨伊首先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其次才是财富的分配和消费。

(三) 斯密革命：经济理论长期逐步演化的结果——从供给角度的说明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内，英、法两国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始终围绕富国裕民问题发表论著，这只能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中得到解释。在这段时间里，围绕如何富国裕民这一问题，经济学由重商主义发展到古典主义。这是经济学演化中的第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以斯密的《国富论》为主要标志。这场革命是经济理论长期逐步演化的结果，是需要从供给角度加以解释的。如果把这场革命成功的标志定为两条，即斯密的政策主张为公众和政府所普遍接受，其理论体系在专业学术团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则成功的原因要从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的需求落点的变化上加以说明，从造成需求落点变化的因素上加以说明。

斯密革命的要点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方面，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论点。(1) 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由生产性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2) 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一个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及他们之间的分工，而这两者都有待于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有待于节俭。(3) 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在市场上按其自然价格出售，或者说商品的市价能够自动地趋向其自然价格。这就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干预总会使市价长期偏离自然价格；减少干预的具体表现是在外贸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在国内消除妨碍资本和生产性劳动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让市场去调节进出口贸易和资本与劳动的流动。(4) 为了说明自然价格的决定和衡量作用，他提出了价值论和分配论。(5) 为了论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他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

斯密的这些论点对于重商主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但这场革命并非一场格式塔转换，它是斯密在继承前人所创立的知识资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斯密关于财富性质的

看法，在他之前的一些英国经济学家那儿已经出现。在法国，由于约翰·劳计划的破产，斯密的观点也已被重农主义者特别强调，甚至在布阿吉尔贝尔那儿就已经被提出。对于分工的意义，配第早已谈到，斯密的新意见主要是分析了分工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这属于对原有理论的深化。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是重农主义者提出的一对概念，斯密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解释，改变了它们的内涵。斯密的资本理论恐怕与重农主义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在《演讲》中，几乎没有生产性劳动及资本方面的内容，而在《国富论》中，它们却占据了重要地位。关于节俭的意义，休谟已经充分肯定，只是他没有把节俭和资本积累明确联系起来并加以强调，而斯密则补上了这一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是法国人最早提出并产生影响的（虽然严格地讲，英国商人诺思更早便提出了这一主张，但在当时并未发生影响，它被重新发现是在法国人自由放任的主张早已传遍英、法两国之后）。但对这一主张何以能增进财富的原因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当属英国经济学家。在休谟之前，英国经济学家坎蒂隆和范德林特就已经看到了一国所拥有的货币数量对该国的物价水平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还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外贸顺差观。坎蒂隆认为顺差造成的物价上涨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即用相同数量的出口商品可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他也看到物价过高对外贸的不利一面，但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使顺差带来的货币不至于造成过高的物价。范德林特认为当时的英国经济苦于货币不足，所以坚持顺差论，但反对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顺差，主张自由放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来实现顺差。休谟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建立了进出口贸易自动平衡理论，由此证明在自由放任条件下，重商主义的顺差论是一个无法长期实现的目标，同时也证明一国的货币不会长期被输出，而是会自动地趋向某一水平，该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因此政府干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要保持长期顺差是不可能的，防止货币完全流出是在防止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如果把货币也看做是一种商品，当然是一种特殊商品，那么休谟的论点实质上是说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货币会自发地趋向其自然价格，这是使进出口保持平衡，使一国的货币数量不再变化的那种自然价格。可以说，坎蒂隆和范德林特提出了最终将置重商主义于死地的理论，即货币数量论，但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政策目标——外贸顺差。而休谟则运用货币数量论，揭穿了重商主义政策目标的不可实现性，以及其政策手段——政府干预——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斯密则进一步将休谟对特殊商品货币所作的上述分析，推广到所有商品上。斯密与休谟是有交往的，他不可能不从休谟那儿受到启示。用今天控制论的术语来讲，休谟提出了一国货币的供求在其价格的作用下自发趋向均衡的负反馈机制，而斯密则指出这一负反馈机制存在于一切商品中。因此，不仅在外贸方面，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在一切商品中，政府干预同样不必要。自由放任条件下一切商品自发趋向供求平衡，市价自发趋向自然价格，而这又将是更有利于财富生产的状态。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斯密革命是经济思想逐步演化的结果，在相当长时间里，有不少经济学家或者在基本理论上，或者在政策主张上，或者在这一问题上，或者在那一问题上，陆续提出了一些否定重商主义的命题。斯密的作用便是把这些分散的命题连接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斯密并不是简单地把前人的东西拿来放在一起。由此可知，斯密革命并非一种非理性的现象，一种顿悟，一种难以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一种格式塔转换。它只是长期演变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四）斯密革命：需求落点的转移

经济理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本，有助于说明斯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但无助于说明斯密革命是何以成功的。有两个例子，说明单凭理论本身的特征并不能保证该理论取得成功。一个例子是英国商人达德利·诺思在1691年匿名发表的《贸易论》，这是第一部鼓吹自由贸易的小册子。李嘉图在1822年对它评价甚高。但这本小册子竟被埋没了一个多世纪，何以如此？生不逢时。17世纪末，英国的国力尚不强大，仍需借助政府干预来发展经济，一本鼓吹自由放任的小册子自然不可能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尽管它迎合了他们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因于1841年写了一部反对斯密自由贸易主张的论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难道自由贸易的主张不正确吗？非也。问题是在当时的德国，斯密的主张无助于经济发展，不能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当时的需求落点只能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

斯密革命的成功，首先在于1776年以后的英国已不再像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那样，仅仅是二流国家，它已经开始成为超过荷兰和法国的一流强国。18世纪最后20年出现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终于成为整个19世纪的一流强国。在这样一种国势之下，自由放任无疑是比政府干预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因此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便逐步由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转变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放任政策，为自由放任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斯密体系便为公众和政府所普遍接受。

斯密革命成功的又一因素是把以往零散出现的经济思想综合成一个理论体系。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国富论》一书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不难看出的，因为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协调整理这一工作。在他之前，英国的经济学论著大多是商人、哲学家们所写的，不成体系。斯密是第一个以学者身份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人。这使他比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人更容易为专业学术团体接受。当然，单凭建立一个体系并不能被专业学术团体接受。重商主义者詹姆士·斯图亚特曾于176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但由于政策主张不适合时代的需要，故未能在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中取得成功。所以，政策主张提出得适时，是斯密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能建立一个为其政策主张进行论证的理论体系，是斯密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二、解释和消除收入分配不均、论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经济学的主题

（一）收入分配：新的需求指向

英、法两国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发展的第二阶段大致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 30 年代。18 世纪最后 20 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到这时已取得重大成果，随着 1815 年反对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国最终确立了自己一流强国的地位。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处于贫困状态之中；富国的目标实现了，裕民的目标却依旧遥远。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公众和政府的目标逐渐由富国和发展转变为收入分配的公正。政府之所以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将造成政局的失稳。代替富国和发展这一课题，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分配中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能否改善这种现象，如何改善这种现象，便成为新的热门课题。这种新的需求指向，使得这一阶段中英、法经济学的主题由发展论转变为价值论、分配论。

当然，这种新的需求指向虽然是主要的，但决不是惟一的。在这一阶段，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克服波动，如何说明国际贸易，同样也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

围绕这些课题，经济理论也获得长足的发展。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一般不展开论述这些领域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

1817 年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的出版，可以看成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李嘉图在《原理》一书中提出把收入分配作为研究重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确立支配收入分配的法则。李嘉图在写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反对马尔萨斯关于经济学是研究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科学的说法，强调经济学应当探讨决定产品在共同制造这种产品的各阶级当中进行分配的法则。可以说，李嘉图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方面，是与斯密有重大差别的。斯密强调的是富国裕民、经济发展，价值论、分配论只是附论。李嘉图则相反，把发展论抛在一边，突出强调了价值论、分配论。当然他也谈到发展，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但他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说到底还是以分配论为中心。在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方面，恐怕还是马尔萨斯更符合斯密的原义。但这恐怕也是他在 19 世纪不如李嘉图享有那么高声誉的原因之一。当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已经不再是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是收入分配时，马尔萨斯显得落伍，而李嘉图则迎合了新的需求指向。

（二）价值论、分配论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自李嘉图的《原理》发表以来，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整个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初 20 年

的绝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而作为分配论基础的价值论，也才开始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对于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运用内容定量分析法来进行严格的判定，任何一位通读过李嘉图之后的重要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詹姆士·穆勒、西尼尔、约·斯·穆勒、杰文斯、马歇尔，等等）的主要论著的人，都会肯定这一断言。

在法国，自从西斯蒙第于181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之后，发展论的主题也逐渐让位于价值论、分配论，还有周期理论。在法国，主题由发展论转变为价值论、分配论和周期论，是以对发展论的反思为开端的，突出表现在西斯蒙第的《新原理》一书中，该书对经济学说以财富增长为目标提出了质疑，对斯密学说提出了质疑。

在英国，上述主题的转变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的。在斯密那儿，资本积累是增进分工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基本因素；而节俭则是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循着这一思路，李嘉图很自然地把发展论的主题转换成价值论、分配论的主题。在工人只赚取维生工资的条件下（这仅仅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现实，斯密显然并不具有这种观点），要依靠工人的节俭来积累资本是没指望的。而由于地主阶级的挥霍天性，要依靠地租来积累资本也是勉为其难的。这样，惟一能履行积累职能的便是资本家阶级，积累的源泉便只能是利润。于是，收入分配便成为支配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增长因素的研究就这样转变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同时，斯密也在李嘉图等人的笔下，被解释为一个主要是研究价值论、分配论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应当以李嘉图为界，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划分为主要研究发展问题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配第、坎蒂隆、诺思、范德林特、休谟以及斯密）和主要研究价值论、分配论的后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西尼尔，等等）。后期古典经济学家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不仅在研究重点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方法上两者也存在显著区别。亚当·斯密的方法综合了归纳与演绎，《国富论》中抽象的演绎推理与具体的历史分析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李嘉图的方法则是纯粹的演绎法，从一些高度抽象的假设前提出发，推导出理论结论和政策结论。在他的《原理》中可以说完全没有历史。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法对以后的经济学说尤其是英国经济学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历史学派除外。因此英国学者哈奇森认为李嘉图（连同老穆勒）造成了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认为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比较，研究主题方面的变化还不如方法上的改变更重要，对后人的影响更大。

方法上的变革显然不能从社会需求指向的变化上作出解释，它显然与李嘉图所掌握的知识资本有关。据说李嘉图在钻研政治经济学之前，曾钻研过自然科学，大概是自然科学在叙述上的抽象演绎法影响到了他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研究重点的转移，尤其是在李嘉图之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那么多英、法经济学家专注于价值论、分配论，这不能不以公众、政府以及专业学术团体三者的需求指向来加以说明。需求指向由发展问题转换为分配问题的缘由，只能从工业革命造成的英、法

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来加以解释。工业革命一方面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国力，使之成为世界上的强国；另一方面则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在初期甚至造成劳苦大众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两方面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使公众及政府关注收入分配，使经济学家去迎合这种需求指向。西斯蒙第、马歇尔等人都是目睹了劳动群众的贫困现象之后而改变观点或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

德、奥两国的经济学同样经历了从发展论到价值论、分配论的过程。当两国经济相对落后时，公众和政府关注的首先是如何富国，如何发展经济。奥地利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霍尼克 1684 年发表《奥地利富强论》，再版 12 次，享誉达一个世纪之久，其主要内容并非价值论、分配论，而是发展论、富国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1841 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其主要内容也不是价值论、分配论，而是发展论、富国论。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在德语世界已经得到传播的时期，李斯特几乎完全不研讨价值论、分配论，而致力于研究富国和发展，这很难单纯从他的个人偏好上去解释，只能看做是德国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的影响结果。继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其论著虽然充满学究气，但透过这层学究气可以发现，他们所关心的仍然是一个发展问题、富国问题。他们与英、法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研究发展的方法不同。他们喜欢采用个例描述，而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侧重于综合归纳。这种区别源于两国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的差异。当德、奥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公众与政府的需求指向也逐渐变化，由关心发展和富国转变为关心收入分配。马克思主义在两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兴起，都标志着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由原来的发展问题转移为价值问题和分配问题。

对于价值论、分配论在经济学文献中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地位，琼·罗宾逊在其《资本积累论》一书的前言中认为，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经济分析，被人用价值论替代了。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也有一种纯粹技术上的、知识上的原因。可惜她在下面的行文中重点分析的是纯粹技术的知识上的原因，而没有分析她所说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其实她所说的政治原因就是由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三者决定的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她正确地看到了古典学派（严格地讲应是早期古典学派）的主题是发展论、富国论，看到了这一主题在后来被转换成价值论。

（三）19 世纪初围绕价值论、分配论展开的争论及小穆勒的综合

在价值论、分配论成为经济学主题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二次综合和一次革命：穆勒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边际革命，马歇尔及威克塞尔所进行的第二次综合。对于这两次综合和一次革命，不能用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的变化来说明，只能用思想产品供给的变化及需求落点的转移来加以说明。

第二阶段初期，即从李嘉图发表《原理》到小穆勒进行第一次综合为止，经济思想的演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围绕价值论、分配论（还有危机论），李嘉图、萨伊、马尔萨